

# 红学家冯其庸：笨功夫才是真功夫

2017年1月12日，红学大家冯其庸在病榻上接受媒体专访时，一句“我下的都是笨功夫”，概括了他一辈子的学术历程，也凸显了他对传统文化的一生挚爱。

冯其庸以《红楼梦》研究名世，著有《石头记脂本研究》《曹雪芹家世新考》《论红楼梦的思想》等红学专著20余种，主持《红楼梦》校订工作，主编《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》《八家评批红楼梦》《红楼梦大辞典》等大型书系。

对于红学，他的一大贡献是抄本。“我小时候就读过《红楼梦》，长大了也读，但真正开始研究《红楼梦》是在1974年，而且一上来研究的就是抄本。”冯其庸说。

1975年，《红楼梦》校订组正式成立，可《红楼梦》乾隆抄本繁多：有甲戌本、乙卯本，还有庚辰本。校订究竟该以哪个本子为底本？这个问题让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争论不休。冯其庸提出用庚辰本，却招致激烈反对。有人甚至对冯其庸说：你主张用庚辰本？拿文章出来说话。

拿文章说话，用证据说话，正是冯其庸的风格。多年后，冯其庸在《风雨平生》中这样回忆：“研究庚辰本，我用最笨的方式。用各个本子跟庚辰本来对，一句一句对。”

当10万字的《论庚辰本》出版后，不仅成了第一部系统研究《红楼梦》版本的专著，也引起了国际红学界的关注。第一次国际性的《红楼梦》研讨会在美国召开时，举办方特邀冯其庸赴美参加。

一辈子，一部书。冯其庸用半个世纪的光阴研究《红楼梦》，最终花5年时间，写成了《瓜饭楼重校评批〈红楼梦〉》。这可以说是他全部红学研究的总汇，是他一生心血所聚。然而，红学大家的身份，并不能囊括冯其庸的全部。2012年初，汇聚了冯其庸一生学术精华的1700万字、35卷册的《瓜饭楼丛稿》付梓出版，皇皇巨著，是对冯其庸完整学术生涯的总结和提炼。

出身贫寒的冯其庸边种地边自学，到处找书读。在读到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》时，冯其庸被这位圣僧以万死不

辞的勇气赴西天取经的精神所震撼，不知不觉在他年少的心里种下了求学求真的种子。若干年后，这颗种子发芽、生长，最终促成了一次学术壮举。自1986年至2005年的20年间，冯其庸以古稀之年陆续完成十进新疆、三登帕米尔高原、两次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等壮举，终在海拔4700米的明铁盖山口，找到了玄奘取经回国的山口古道。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赞冯其庸“做了我们没能做的工作”。

对冯其庸来说，实地考察也是一种“笨功夫”。在他的“人生总结”《风雨平生》中，冯老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强调：“我一向认为除了应该读书架上的书外，还必须读保存在地面上、地底下的各种历史遗迹和文物这部‘书’……对于一切学术的结论，没有可靠的文献，没有可靠的实地调查挖掘，就很难做出确定的结论。”不管到哪里，冯其庸都能跟做学问联系起来。

不仅潜心于学问，冯其庸还寄情于诗书，结缘于翰墨。曾有人求教他学问与书法之间的联系，他说：“我搞学术



是下苦功夫，究根穷源，找不到证据不罢休。学书法也要有钻研精神，比如对《兰亭序》，我是反复研究的。藏在日本的《丧乱帖》在上海展出，我特地到上海去观摩。看，就是学。不仅要临帖，还一定要多看。年轻时我曾将喜欢的法帖张贴在家中门内，进门出门反复看，时间久了，就刻在心里了。”

“苦功是基础，功夫还没练好，就想创新，不符合规律。”冯老说。

诚哉如斯，笨功夫才是学术的“真功夫”。

《解放日报》文/顾学文

## 京城有个“千柏叟”

——“老科普”居云峰纪事

提起居云峰，熟悉他的人都会说他是个“老科普”，还爱好诗词创作，近来他又多了个奇异的名号——“写柏能手”。

与居云峰相识，是在2000年他出任中国科普研究所所长之时。2007年他退休任职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以来，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了解。如今，他彻底卸职“放松”了，更凸显出原先没被朋友们所认识的一面。

居云峰写生北京古柏树，是近几年的事。2013年他开始拿起硬笔写生北京古柏树，时间不长，却很快就成为能手、高手。3年时间写生古柏树1000多棵，每棵古柏画一幅写生。浏览他的写生原稿，只见各种各样的柏树形态各异，活灵活现，其数量之多和内容之专实属罕见。

云峰写生足迹遍及北京各处。既有故宫御花园、北海公园、景山公园、颐和园、圆明园、天坛等名胜，也有地坛、先农坛、日坛、卧佛寺、孔庙、国子监等古迹。他每到一处，不是游山玩水、欣赏美景，而是首先发掘写生地点古柏的数量、分布、树龄等信息，然后按图索骥，每天写生一幅古柏，并将古柏的生长地点、北京市园林局颁发的古树编号等一一记录在案。这就相当于在每棵古柏的“身份证”

上又增加了图像信息，颇有科普意义。

2014年12月，科学普及出版社推出《北京古柏——云峰硬笔写生》一书，收集了云峰前期写生300多幅。图书出版后被国家图书馆、首都图书馆等收藏。英国的马丁·鲍尔教授看后感到很有新意，特托朋友索书一本。他的部分写生稿参加中直机关举办的庆祝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书画展获二等奖，天坛公园科普园地曾用5个展板、18幅写生作品进行宣传展出，中国科普研究所则将其22幅写生原稿装裱作为出访礼品赠送外宾。

许多在现场看到云峰写生的游客，直夸赞“真像！”“生动！”“独有特色！”并用手机拍照留念，有些还请求赐画，或者要求购买。画家王强翻阅云峰的写生本后说：“作品很有创新，独树一帜，我很喜欢。”中国科协离休干部、研究员齐仲写诗“谢赠画：居所退不休，云山任遨游。峰回路转处，古柏上笔头。”

云峰之“奇”，在于他不是专业画家，也没学习过专业绘画课程，甚至没有上过老年书画培训班，却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，完全在于他的坚韧、勤奋。他把这个“活计”作为学问研究，作为科普追求，作为快乐享受，或许也有一些天分

吧。他写生古柏的目标是1000棵以上，为此还给自己起了一个笔名，叫“千柏叟”，意即做拥有1000棵古柏的老翁。

愿望实现后，云峰这样总结写生古柏的四大益处：一是有助于促进再学习，二是丰富审美情趣，三是感悟人生，四是文化养生。他不无自得地写道：“人生如树树如郎，谁无风光谁无伤”，“有直有曲生存道，平安是福成寿老”。

文/尹传红 谢丹杨



云峰以古柏作为专题写生，每一幅为一完整的画作，颇有创新：其一，写生工具。将铅笔、钢笔、圆珠笔、签字笔、炭素笔等混合使用，统称“硬笔写生”，对应于毛笔、排笔、毛刷等软笔写生。其二，枝叶表现。有自己的理解和画法，将“点”作为最短应用，创造既真实又朦胧、既简洁又厚重的效果。其三，综合工笔和写意的一些风格。其四，写生载体。运用A4纸和A4素描本，便于携带写生和复制。其五，文化记载。此外，在写生之余，他还发掘、采风，记录了古柏生长地简介、名木传闻趣事等。

## 梁启超举荐陈寅恪

1925年，清华大学创办国学研究院，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向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担任国学院导师。当时国学院已有王国维、梁启超、赵元任三位导师，均为学富五车的大师。而陈寅恪是刚刚回国的留学生，30来岁，校长曹云祥从未听说过他，因此犹豫不决。考虑再三，他决定去征求梁启超的意见。

曹云祥来到梁启超府上，问梁启超：“陈寅恪是不是博士，有没有重要著作？”梁启超回答说：“陈先生既不是博士，也没有什么著作。”曹云祥听了直摇头说：“陈寅恪既没有博士文凭，也没有著作，我怎么能聘他当导师呢？”

梁启超听了大笑说：“我梁某人也没有博士头衔，不是照样当导师？至于著作，我梁某人算得上是著作等身了吧，但我所有的著作加起来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，但我所有。”

接着，梁启超向曹云祥详细介绍了陈寅恪，并介绍了柏林、巴黎等大学几位教授对陈寅恪的赞誉，终于说服曹云祥，破格聘请陈寅恪担任国学院导师，使陈寅恪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。

人民政协网

## 沈从文如此教写作

1928年8月，担任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，破格延聘沈从文为中国公学国文系讲师。从此，沈从文走上大学讲坛。沈从文主要教小说写作，他讷于言辞，但他充分发挥自己写作的特长，教得十分认真，为人们所称道。

在教学中，沈从文为了给学生做习作示范，自己动手写小说，他用不同的艺术手法，写了许多表现不同生活题材的作品，在艺术上做了多方面的探求。

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时，跟从沈从文先生学习写作，他在《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》一文中，也记述了沈从文教写作的情况：“沈先生教写作，写的比说的多，他常常在学生的作文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，有时会比原作还长。这些读后感有时评析本文得失，也有时从这篇习作说开去，谈及有关创作的问题，见解精到，文笔讲究……还会介绍你看一些与你这个作品写法相近的中外名家的作品。”毋庸置疑，能做到这一点，没有敬业精神和对学生负责的态度是不行的。

不仅如此，沈从文先生还做着“绿叶”的工作，学生习作写得较好的，他就自掏腰包寄到相熟的报刊上发表，这对学生来说是很大的鼓励。在他的教学生涯中，经他介绍出去的稿子不计其数，光是寄稿子用去的邮费也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目，令人敬佩。

搜狐教育

## 茅盾的两桩心愿身后得以实现

茅盾于1981年3月27日清晨去世，临终前，他叮嘱儿子韦韬和儿媳陈小曼：“那两封信一定要在我死后上报党中央和交给中国作家协会，不要在我生前交出。”这是茅盾未了的两桩心愿。

茅盾所说的两封信写于1981年3月14日，是在他头一天较严重的昏迷之后，又清醒过来笔录的。儿子韦韬笔录完毕，念给父亲听。茅盾点点头，执意要儿子扶他起身，勉强握起用了一辈子的笔，郑重在上报党中央的信件签上了“沈雁冰”三个字，又在致中国作家协会书记

处的信件签上了“茅盾”两个字。

**致党中央的信是：**

亲爱的同志们，我自知病将不起，在这最后的时刻，我的心向着你们。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我追求和奋斗了一生，我请求中央在我死后，以党员的标准严格审查我一生的所作所为，功过是非。如蒙追认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，这将是我一生的最大荣耀！

**致中国作家协会的信是：**

亲爱的同志们，为了繁荣长篇小说的创作，我将我的稿费二十五万元捐献给作协，作为设立一个长

篇小说文艺奖金的基金，以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。我自知病将不起，我衷心地祝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昌盛。

茅盾逝世后，党中央于1981年3月31日决定，恢复茅盾的中国共产党的党籍，党龄从1921年算起。中国作协以茅盾名字命名的“茅盾文学奖”，也于1981年10月正式启动，并于1982年颁发了首届“茅盾文学奖”。

茅盾的两桩心愿在他身后都得到实现，他若泉下有知，一定会感到满足和欣慰的。

《文史博览·文史》文/张亚辉